

陈望道语文论集

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

上海教育出版社

陈望道语文论集

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陈望道语文论集

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12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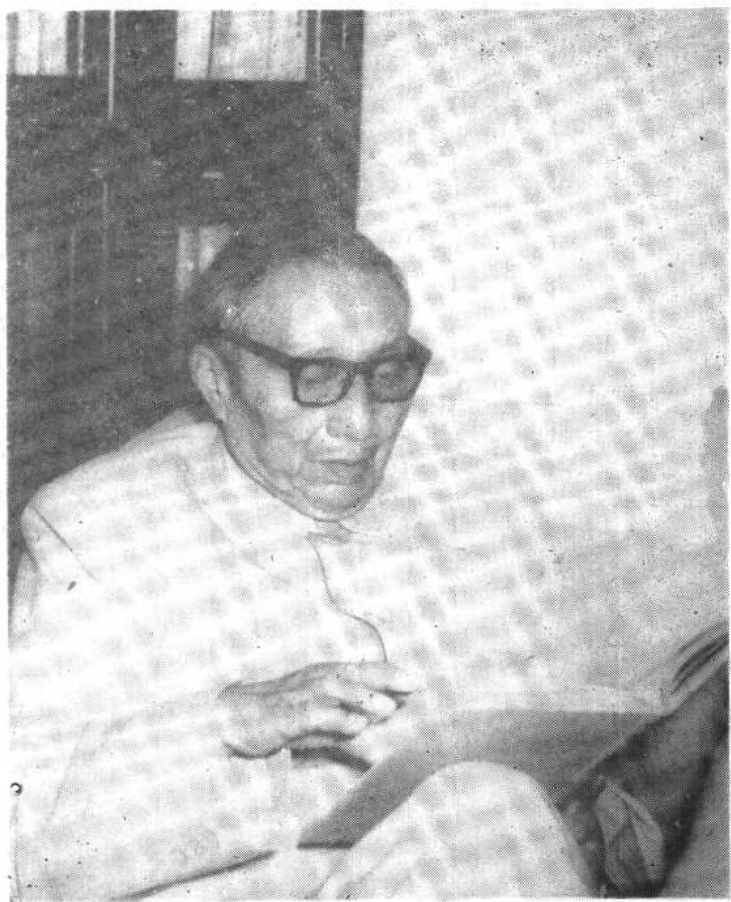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2.25 插页6 字数5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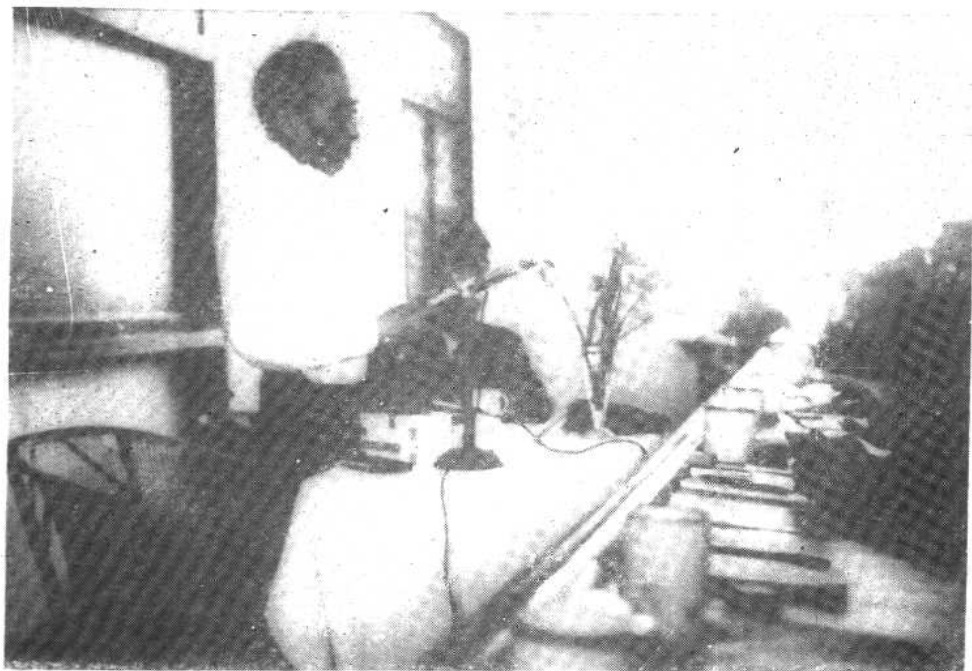
1997年12月第2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50 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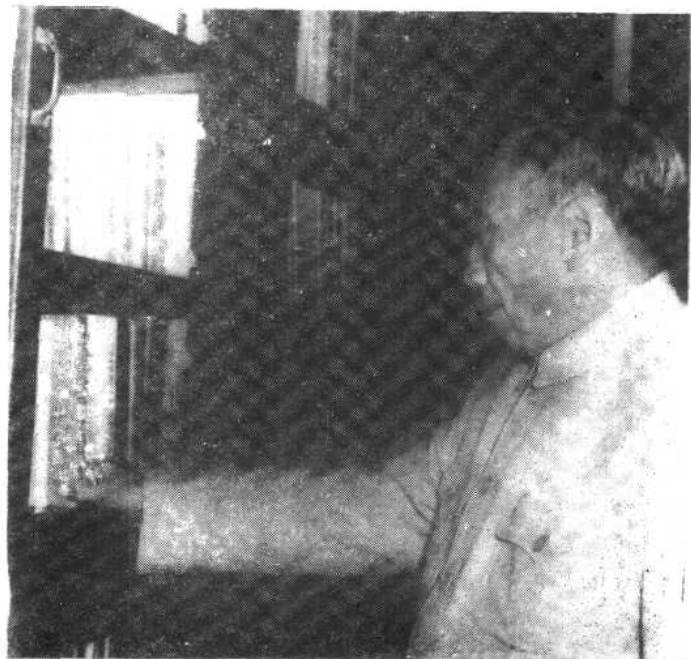
ISBN 7-5320-5429-2/G·5671 定价: 25.00 元



陳清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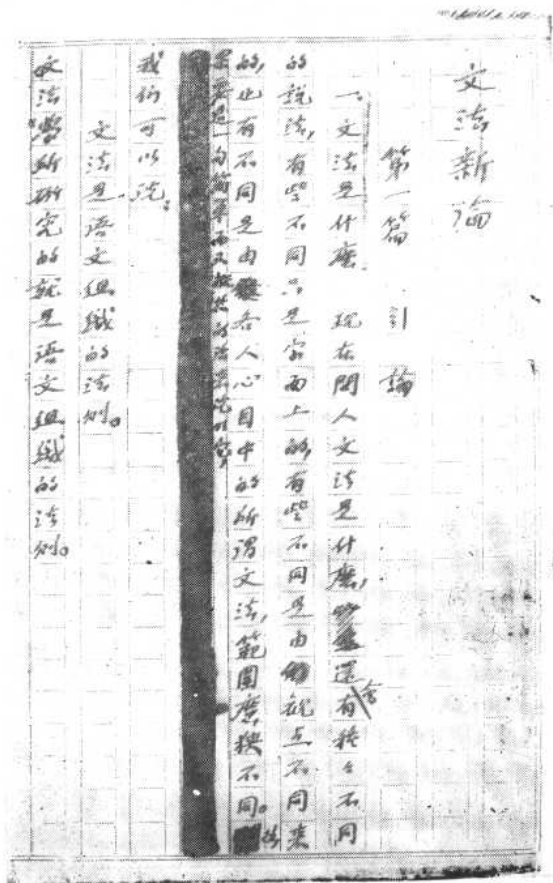
1964年4月在杭州大学
作学术讲演



在书房里(摄于1965年)



与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
同志在一起(摄于 1972
年夏)



作者手迹

编辑说明

陈望道同志是语文学术界的前辈。他不仅在早期翻译出版了我国第一个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和参与创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毕生从事语文教学、语文学术研究和倡导语文改革运动。他的学术研究，注意运用进步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倡创新精神；他主张研究工作要从事实出发，从事实缔造学说，以事实验证学说，反对从成说成论出发。他的研究，力求以大量的事实为基础来进行综合概括，从事实中探寻普遍的必然的客观关系，也就是规律。除了修辞学和文法学外，他在文艺理论、美学、逻辑学、伦理学等方面也都作过认真的研究，出版过多种译、著。

这里编辑的是陈望道同志关于语文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既有语文学术遗产的价值，也有现代语文学术史的史料价值，对于发展我国的语文科学和语文事业，是有用处的。我们也以此来纪念他逝世一周年。

这本论集的编辑工作是在陈望道同志一九七七年十月逝世后进行的。全书共收集文章一百二十二篇，按发表时间的先后，分年编排。这些文章，凡是发表后作者作过修改的，都照着作了修改；作者未曾修改过的，我们编辑时在个别字句上偶有改动，但不牵涉内容。同时，对原文的印刷错误或其他讹错，尽可能地作了校正，对有些需要说明的问题，作了必要的附注。有关讨论的文章，为便于读者的阅读了解，也附录了几篇别人的文章。作者有关见解和术语前后或有不同，编辑时保持原文不加

统一，以表示作者看法的演变和反映语文学科的历史进展。

这本集子的编辑出版工作，自始至终都得到倪海曙同志的热情而具体的帮助，也得到另外一些同志的关怀和支持。我们谨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

一九七八年五月

DX72/29

陈望道同志传略

陈望道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名参一、融，浙江义乌人，生于一八九〇年十二月九日。

陈望道同志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里。他六岁入学，一直到十六岁前，就读于故乡义乌分水塘的私塾，并在课余参加农业劳动。一九〇六年，他十六岁，进义乌县立绣湖小学学习博物与算术；十七岁随长者在乡办学，当教员；十八岁考进金华中学，在校学习四年，成绩优良；继而在上海某补习学校、浙江之江大学学习。一九一五年一月赴日本留学，前后四年，在东洋大学修习文学、哲学，在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修习法律，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得到法学士学位。与此同时，他又进物理专科学校的夜校学习数学、物理等科目。留学期间，陈望道同志于课外努力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对于他后来从事革命宣传和以进步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学术研究有直接的和重大的影响。

一九一九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陈望道同志也就在这一年五月从日本归国。六月应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聘请，任该校语文课教员。这时，“五四”运动的浪潮已冲击到浙江，他立即投身于这个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他在浙一师和一些进步师生的革命行动，遭到了反动当局的迫害，被加上“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的罪名；反动当局并下令对他和几位进步教员撤职查办。这一反动措施当即受到校长和全校师生的猛烈反对，拒不执行，反动派就出动军警包围学校，酿成了有名的浙江一师风潮。这

次风潮得到全国声援，迫使反动当局收回所谓撤职查办的成命。事后，陈望道同志也就“自动离职”。经过这次斗争的锻炼和启发，他在一九一九年底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村专心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

一九二〇年春，陈望道同志应陈独秀的邀请到上海编辑《新青年》杂志，并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这时，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了他翻译的我国第一个全译本的《共产党宣言》。一九二〇年十二月，陈独秀赴广东，他又负责《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在坚持《新青年》杂志办刊的革命方针的斗争中，他和鲁迅先生结成了战斗友谊，同胡适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期间，他又参加上海工人运动，组织了纺织、印刷、邮务等工会，并亲自到沪西工厂区开办工人夜校和平民女校。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间，他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他自己主编的副刊《妇女评论》上，发表了许多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倡导妇女解放和主张社会改革的文章，对推动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发展起过积极的影响。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陈望道同志在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等职，和全校师生一同参加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一时期，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宣传方面，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望道同志在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的同时，还积极从事文化教育教育工作。从一九二〇年九月起，他就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一九二七年上海大学停办后，他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直至一九三一年，因反动派要加害他才离开。他注重用新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对文学和语言文字的研究；认为传统的以熟读和模仿为主的语文教学方法不科学，效率低，因此竭力主张

改革，要求语文教学方法具有科学性，反对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传统观念。当时他写了许多文章，对于白话文的普及和提高、新文艺的发展以及文法修辞的科学研究方面提出了积极和进步的见解。他早从一九一八年起，就发表了《标点之革新》（《学艺》一卷三号）等许多篇提倡新式标点的论文，是最早在刊物上明确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他在一九二二年发表的《作文法讲义》，科学地说明了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在当时的作文法著作中，独具特色，很有影响。为了研究文法修辞，他又对美学、因明学、伦理学等进行研究，著有《美学概论》、《因明学》等书。他还努力介绍国外的社会科学学说和新兴文艺理论，作为宣传新道德、发展新文学的借鉴。他翻译有《艺术简论》、《文学及艺术之技术的革命》、《社会意识学大纲》、《苏俄文学理论》、《艺术社会学》等国外重要著作。一九二八年及其后一段时间，他和几位朋友办了大江书铺；在鲁迅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下，由大江书铺出版了他编辑的《文艺理论小丛书》、《艺术理论丛书》，发行了《大江》月刊和《文艺研究》季刊，介绍宣传科学的文艺理论，为新文艺运动的深入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三一年七月，国民党反动派因陈望道同志保护左派学生，密令加以暗害，他被迫离开了复旦大学。这时，他就专心从事《修辞学发凡》一书的著作。他有感于自古以来我国许多文人在修辞上花了很大工夫，却没有一部系统的著作，早年就开始对修辞学进行科学的、系统的研究；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他开了修辞学课程，编了讲义，并不断加以修订。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终于在一九三二年写成了《修辞学发凡》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今语文的修辞学专著。这部著作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对汉语文中古今各种修辞现象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并对修辞学的对象、任务和研究方法作了科学的论述；

同时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保守复古的偏见，如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等等进行批判，理论联系实际，为我国修辞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境界。

当时，他除了从事著述外，还参加创办中华艺术大学等社会活动。一九三三年七月，他应聘到安徽大学任教“文艺理论”，不到半年，又因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而离职，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回到上海。这时国民党反动派配合对苏区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在白区也加紧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提出了“尊孔读经”、“文言复兴”等反动语文政策。陈望道同志团结在鲁迅先生周围，坚决反对和冲破敌人的这种“围剿”。一九三四年六月，陈望道同志与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陈子展、乐嗣炳等人，针对国民党的“文言复兴运动”，发动了“大众语运动”，不但反对提倡文言文，而且对当时白话文出现的脱离群众语言的倾向也进行批判，提出白话文必须进一步接近活的口语，主张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展开了一场极其热烈的语文论战。在这次论战中，他发表了《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建立大众语文学》、《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大众语论》、《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文学和大众语》等文章，对“大众语”的建立提出了许多科学性、建设性的意见，并和保守反动势力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大众语运动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它给了国民党反动的语文政策以强有力的打击，也对后来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九三四年九月，陈望道同志在鲁迅先生的支持下，创办了《太白》半月刊。这是实践大众语的刊物，它与林语堂之流为迎合保守反动势力，鼓吹所谓“幽默”的小品文，提倡半文不白的语录体而开办的《论语》、《人间世》等刊物相抗衡，用战斗的小品文去揭露和批判当时黑暗的现实。“太白”这个名称，意思是提倡“白而又白”、“比

白话还要白”的“大众语”；同时“太白”也就是“启明星”，寓意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胜利的曙光而战斗。《太白》半月刊在陈望道同志的主持下，的确是战斗得很有生气的，譬如首倡在刊物上用民间的“手头字”，首创“科学小品”这样的新文体，开辟“掂斤簸两”的栏目，专登匕首式的杂感，在当时都是别开生面的。鲁迅先生曾表扬这个刊物说：“杂志上也很难说话，现惟《太白》、《读书生活》、《新生》三种，尚可观，而被压迫也最甚。”（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四日致吴渤信）《太白》战斗了整整一年，出了两卷廿四期，最后被迫停办。

《太白》终刊后，陈望道同志便到广西大学任中文科主任。一九三七年六月，抗日战争前夜，他又从广西回到上海，参加党领导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从事抗日救国运动。一九三八年，他在地下党办的夜大学“社会科学讲习所”任课。同时，他积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起和组织了“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等进步语文团体；他又热情支持“上海新文字研究会”等抗日的群众性文字改革组织，帮助青年们修改了拉丁化新文字理论中诸如废除汉字一类脱离实际的、过“左”的提法，改正了方案中一些错误和缺漏。他是上海战时语文运动的一位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他亲自主编地下党报纸《译报》上的《语文周刊》，并在拉丁化新文字的理论刊物《中国语文》上经常发表文章，在文改团体举办的语文讲座发表演讲。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敌伪的恶势力已侵入租界，敌伪特务机关的黑名单上有了他的名字，他还以“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的名义发起举办为期十天的大规模的“中国语文展览会”，对青年和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文字改革。这一时期，他编制了《拉丁化汉字拼音表》，发表了《中国语文的演进和新文字》、《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小记》、《补记》、《语文运动的回顾和展

望》、《从“词儿连写”说到语文的深入研究》等文章，对新语文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他还在语文学术界发动关于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这次讨论，从一九三八年开始，一直到一九四一年，历时四年之久。讨论的总的倾向，就是革新《马氏文通》以来，中国文法研究不从中国语文的实际出发，一味机械模仿和照抄照搬外国文法的传统风气；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汉语的词类区分，并由此而涉及到整个汉语语法体系的各方面。在讨论中，陈望道同志先后发表了《谈动词和形容词的分别》、《“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从分歧到统一》、《回东华先生的公开信（论文法工作的进行、文法理论的建立和意见统一的可能）》、《漫谈语法学的对象以及标记能记所记意义之类》、《文法革新问题答客问》、《答复对于中国文法革新讨论的批评》、《文法的研究》等十余篇论文，从方法论上批判了机械模仿、生搬硬套的错误，并且提出了“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序言）的许多建设性意见。他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用功能的观点来研究汉语文法的见解，可以说是这次讨论的重要成果之一。这对于今天汉语的文法研究也还有着现实意义。他又把讨论的文章编辑成《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于一九四三年由重庆文事出版社印行，为汉语语法学史提供了一部有价值的文献。

一九四〇年秋，陈望道同志为避免汪伪汉奸的迫害，从上海经香港转赴抗战后方，回到当时迁校于重庆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一九四二年起任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等职。这时，他和地下党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给予进步学生以支持和帮助，积极营救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青年学生。他亲自募捐筹款兴建了一座“新闻馆”，成为全校进步学生活动的中心。他

还曾与几位进步教授一起邀请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到北碚北温泉同大家见面。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望道同志于一九四六年六月随同复旦大学迁校回上海。当时，复旦大学进步师生与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势力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他积极配合党的地下工作，尽力保护和支援革命师生，为此反动派曾不断地对他恐吓威胁，策划要把他赶走，但他从不屈服，斗争坚决。同时，他又在一九四七年发起成立“中国语文学会”。解放前夕，他又负责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的工作，团结和组织广大教授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等民主革命运动。国民党特务将他列入黑名单，妄图加害，由于上海的迅速解放，他们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全国解放后，陈望道同志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华东高教局局长，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校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四届代表，第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四届代表和第三、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党的纪律，作风正派，勤勤恳恳地完成党交给他的所有任务。在民盟和政协的活动中，他坚决贯彻执行党对民主党派的方针政策，为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努力改造世界观、自觉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做了大量的工作。

建国以来，陈望道同志虽已高龄和社会活动繁忙，但仍然坚持学术研究工作。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主席、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上海市普通话推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为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方针，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事业不辞辛劳。一九五五年，他参加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在文字改革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在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上作了总结发言。他为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努力贯彻和实践党的语文政策，在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一九五六年元旦，陈望道同志在上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谈话中，毛主席很重视和关心他的文法修辞的研究，这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这时他正在筹建复旦大学文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后来改名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准备在学校中有计划地展开科研工作。后来他就亲自主持这个研究室，明确主张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汉语的实际出发，运用功能观点，探索汉语文的组织规律。他积极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发表了《对于主语宾语问题讨论的两点意见》、《怎样研究文法修辞》、《漫谈〈马氏文通〉》等文章。他在《漫谈〈马氏文通〉》一文中评述了《马氏文通》以来汉语文法研究的各种倾向，有力地批判了汉语词类区分上的意义说和形态说。他很注意我国文法学术遗产的整理，一九六二年，他经过确切考证，纠正了过去认为明代卢以纬曾著《助语辞》一书的旧说，查明了卢以纬是元代人，他著的书名为《语助》；又考证了《语助》成书于泰定元年，即公元一三二四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一本分析虚字用法的专著。同时，他又曾多次在上海语文学会和高等院校作学术讲演，并于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先后到南京、杭州等地讲学，展开学术交流活动，促进语文研究的发展。一九六一年以后，他担任修订《辞海》的总主编，团结和组织了各方面的专家来完成修订

任务。经过四年的辛勤劳动，于一九六五年出版了新《辞海》（未定稿）；成书时，他为书名题了字。

一九七二年他被任命为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这时他已是八十二岁的高龄，又患有多种疾病，但他仍以饱满的革命热情从事工作。他不满林彪、“四人帮”一伙对科学研究的破坏，根据周总理关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不能随便撤销的指示，坚决要求恢复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一九七二年，语言研究室初步恢复，他就发表了《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等论文，接着又修订重印了《修辞学发凡》。他不满林彪、“四人帮”对文化教育事业的破坏，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一贯教导，在一九七三年为复旦大学团委、学生会举办的书法展览会题了笔力苍劲的“又红又专”四个大字，表达他对青年一代的希望。虽然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时常要住院治病，但他仍然努力完成党分配给他的任务，一九七三年八月，他抱病出席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五年一月，又抱病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一九七五年十月，陈望道同志病情加重，但他在医院里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学校工作。一九七六年元旦，毛主席词二首发表，他应《文汇报》之请写了《巨大的鼓舞》一文，表达自己的感受。可是文章发表时却由“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作了删改，竟删掉了原文中这样一段重要的话：“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在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样一个宏伟目标。”对此，他十分气愤。周总理、朱委员长和毛主席相继逝世的噩耗传来，他极其悲痛，十分忧虑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后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胜利的消息传来，他极为高兴。一九七七年一月，为纪念敬